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对鄂西南一个移民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李滨利, 谭志满

(湖北民族学院 党委宣传部,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个案, 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 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 发现在当下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移民村落; 历史记忆; 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1(2010)03-0055-05

明初时期, 朝廷出于震慑土司、巩固边防的军事目的, 在鄂西南地区设置了卫所屯堡, 由中原来的军队驻守, 实行家属同驻制度。这些中原移民到现在仍保留自己的祖源记忆, 在历史的发展中, 中原移民作为鄂西南土家族民族成员, 却并没有达到对本族深刻的认同。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正是在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文化的建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而其族群的历史记忆成为当前维系族群的根本纽带。历史失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境中。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环境, 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 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 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1][2]}。鄂西南朱砂屯村民——一个具有卫所移民特征的族群认同就是通过历史记忆的选择、强化、重整与遗忘来实现的。本文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例, 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 试图论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联, 探讨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的重要意义。

一、朱砂屯村的族源与身份认同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位于鄂西南清江流域上游。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西南的交通要道, 也是众多族群频繁迁徙的场所, 同样也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积淀地。但自土家族形成一个共同体以来, 该地区一直是汉、土家文化交汇之地。据清光绪

《利川县志》记载:“县境, 明代立屯, 屯有城隍庙, 今庙有存者, 马桥、朱砂、木栈、三渡、支罗五屯而已。”^[2]这里所指的朱砂就是明代在施州卫设立的军屯所在之地。

有明一代, 为了防御鄂西南土司的内扰, 巩固边防, 朝廷在这一带设堡建屯, 强化边疆。目前, 有些屯堡至今还沿用旧名, 有些已在历史变迁中消失。“朱砂”就其地域范围而言,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慢慢缩小, 今只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团堡镇的一个行政村。该村以朱姓为主, 有“东头朱”和“西头朱”之分。除此之外, 郜、冉两姓为当地“原住民”, 其余都为解放后外迁单姓。正如当地民谣所说:“藤连藤, 瓜连瓜, 必须服从朱族管理”, 形容朱姓人多势重。

关于朱砂屯村村民的来源, 有多种多样的演绎版本:

其一: 村里的老人认为, 最先来此地落籍的有八大姓, 即朱、王、郜、蒋、张、谭、牟、冉等姓氏。朱家是给郜家挑担子来的。村里的朱家巷子原来叫郜家巷子。目前村里还有郜姓人氏 30 多人。由于朱家会看阴地, 郜家只会看阳室, 朱家发人, 最后成了以朱姓为主的村落。

其二: 朱砂屯村志记载,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氏兄弟公干入蜀, 行至此地, 见地势平坦, 古树参

收稿日期: 2010-04-16

作者简介: 李滨利(1975-), 女, 湖北利川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

天,确定就此定居,住于一株大杉树中,后兄弟俩分东西两头居住,挽草为界划地,垦荒种粮。几年后成了大财主,便从东头花梨树开始建房,一直修到西头的核桃树,形成一条街,名南景街^[3]。清朝中期烧毁。这一说法在朱氏族谱中得到印证。东头《朱氏族谱》载:“原籍南京应天府历阳县小地名猪市街朱家巷高坎堰人。始祖朱金九,自先皇明太祖朱洪武十四年始祖来此落业,住居兹土地,府份先名施州卫,后改施南府,自乾隆六年设县名为利川县朱砂屯。”“钦命宗室金九公带领从龙二十一姓分屯施属以备远患,更以韩臣忠烈封为城隍,谕诸屯立庙祀之。”西头《朱氏族谱》载:“因元孽犯,洪武十三年,弟兄致仕携家,由荆州石马头箬箕坳起岸,抵施州卫。大祖家于卫所(施城北关)。二祖、三祖同家于卫属利邑东五保之硃沙屯大核桃树。……奇二祖,次子海,生端、成、方、元四公。端克绳祖武,英勇多才,特骑尉职,以剿贼,调拨支罗所,受支罗屯田。成、方、元三公留住本屯。”

东、西头朱氏的《族谱》上的文字是对朱砂屯朱氏自明洪武年间奉命迁来施州卫屯垦的明确记载。东头朱氏来施始祖朱金九带来的21姓人,应是21个军人之姓。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目前郜姓、冉姓是当地的原住民,除朱姓外,两姓为村里的第二大姓。并且两姓的族谱也有关于“征南而来”的记载。朱金九在朱砂屯落业时所见大杉树和其后朱氏所建屯隍庙今已不在了,但其地名仍在沿用,足以证明朱氏族谱对朱氏迁施历史记载的可信。

其三:郜氏《家谱》开篇即道:“始祖:郜贞叔,于洪武七年选充小旗,至十四年调拨施州所小旗,十六年赴京并得胜,充总旗。二世祖:郜胜,于永乐赴京,八年并枪(原文所有“枪”均作“仓”,误)得胜总旗。三世祖:郜友贵,未王*符借买军。四世祖:郜文于弘治十年取赴本省都司,并枪得胜,仍充总旗。五世祖:郜斌继,于正德十三年并枪得胜充总旗,管军千户。六世祖:郜永管,于嘉靖元年并枪得胜,充总旗,管军千户。六世祖生子四人,长子兴思于嘉靖三十二年并枪得胜,充总旗,管军千户。次子兴杨落业木站屯郜家山,继移马桥屯郜家山。兴福落业支罗旧寨。三子兴仁落业朱砂屯。”

以上所记,勾勒了郜氏入施州卫的大致轮廓。明代卫所兵制设百户所,统兵112人,分为三总旗,十小旗,隶属于千户所。据《大明会典》载:“总小旗缺,务选年深精壮勇敢军人小旗并枪。军人并枪得胜,升小旗。小旗并枪得胜,升总旗。”^[4]郜氏郜贞叔,虽初为小旗,但必为职业军人,非匠户之类,其后

人又多次“并枪得胜”,更可见其家族有尚武的传统。不过,郜氏《族谱》对郜氏职官的记载和县志略有出入。据清道光《利川县志》载:“郜贞叔:都亭里人,洪武十六年充总旗,管军千户。郜胜:即贞叔长子,永乐八年袭父职。郜友贵:胜长子,袭父职。郜文:友贵长子,宏治十年,袭父职为千户长。郜斌继:文长子,正德十三年,袭父职。郜永管:斌继长子,嘉靖元年,袭父职。”^[5]以上两者所记载的郜氏谱系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认定郜氏的卫所军户身份。

其四:冉氏《族谱》记载:入利始祖,明洪武年初由蜀迁利。明皇诰封荣禄大夫,1374年授忠显校尉,湖广千户,湖北施南都会坝长官司,忠路副使佥事。酉阳夔依峒苗蛮谋反,如龙奉旨征苗到利邑。于利东七保溪下马,后称其地为“下马溪”,娶覃氏,诰封惠肃一品夫人。歿后与夫人并葬于“下马溪”北岸。

以上族谱材料显示,朱砂屯村族群的主体大部分是由内地迁往此地屯军的汉族移民。至今村民保持着较为一致的历史记忆,认为他们是从外面迁移而来。但这种祖源记忆并不影响当地人对土家族身份的认同。村支书朱云栋(53岁,土家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个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期,来村里盖章办理民族身份证明的一年要办理30多次,不管是考学、招工、争取救济补助还是其他方面需要证明的,现在很少有人来办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现在土家族和汉族没得(有)区别,我们都是——样。”在1983年民族识别后,朱砂屯被确定为土家族散杂区。目前,朱砂屯村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65.4%,其中以土家族为主,零星的有畲族、苗族,都是近20年因为买地、婚姻等形式外迁而来。村内朱姓、冉姓、郜姓、谭姓是土家族,周姓、张姓是汉族。从目前看来,朱砂屯卫所移民后裔对于自己是土家族的“民族”身份的认同已淡化,这是因为卫所移民群体有着共同的“传统”以及集体历史记忆,而这些集体历史记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代表这群人的符号特征,并维持和凝聚着其族群认同。

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王明珂在《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有精辟分析:由于族群是以共同历史记忆来凝聚,因此族群认同变迁也是以凝聚新集体历史记忆与遗忘旧记忆来达成。这种健忘情形是“经常由于不刻意保存文献及有关文物,或由于口头传承的扭曲与间断所致,而其根本原因经常是现实环境变迁导致的人群认同变迁”^[6]。所以族群认同是以共同(或者

建构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

(一)口述传说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族源传说 有关族源的传说是一个族群主观认同的重要指标。族源传说是构成族群自我认同的最核心内容之一,族源传说的主要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人群的集体记忆,这个族源传说将一群人凝聚起来,以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强调他们不分的文化特征,设定他们与另一些人的族群边界。^{[1]137}

朱砂屯村主要有两个版本的族源传说,即“两兄弟开基说”和“八大姓开基说”。东头朱姓人认为其祖先是“南京应天府奉旨征南”迁来;西头朱氏祖籍为浙江金华府,因“征南”由荆州迁来,两个朱姓来自不同的祖籍地,但在村民的口述村史中常常强调的是关于“两兄弟开基说”的故事。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朱姓两兄弟到此,先落脚在一棵大杉树下,最后才分东西两头住,并且各续各的谱系,互不开亲。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在调查中,我们就两个朱姓既是兄弟为何谱系不一样的问题进行采访时,发现没有人能说清,抑或是刻意回避,只是一味强调他们仅仅谱系不同。在“八大姓开基说”中,八大姓有“张、谭、牟、冉、朱、王、郇、蒋”,目前村里已没有蒋姓,除朱姓外,其它六姓在村里已不再是大姓,问题就在这里,为何在村民口中仍有“八大姓开基说”的记忆。

村民“两兄弟开基说”或“八大姓开基说”所构拟的朱砂屯村村史,是韦伯所谓的“共同记忆”(shared memories)的一部分。这一特定的民间历史显然是由认同的需要而设定的。在这里,祖先的历史并不要求局外人看中的所谓的“客观与真实”,重要的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在朱砂屯村族群意识中,这段拟构的历史是值得崇信的,并在村民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久而久之,这种带有主观意志的口述史同时也成为与其他家庭、家族或族群的心理边界,并以此来构建和强化族人之间的内部凝聚力。

“透过‘历史’对人类社会的讨论,‘历史’都被理解为一种选择、想象或甚至虚构的社会记忆。”^[7]“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遗忘,因此凝聚一个社会(及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114]朱砂屯村人建构出了一整套“八大姓开发此地”或“朱氏兄弟开基说”的社会记忆,这是族群性变迁的

社会表征。显然这些社会记忆和真正的历史不可能符合,它的族源被建构出来是为了用以诠释现实认同的合理性。同样的道理,在鄂西南明初来施州卫的其他地方诸如咸丰唐崖司村卫所移民也有类似的建构,用以解释当前的认同。我们无须去考据这些族源传说的真实性。族源传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撇去部分可疑拟构外衣,作为一种选择性集体记忆,朱砂屯村族源传说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它借开基祖的名义,将属于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宗族成员以扩大血缘方式凝聚起来,强调和固化了族群成员在心理上的认同。第二,它以世代相传的形式在族群成员的意识中不断重复,并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族界标志符号来区分本族和他族。强烈的族群边界,常发生在因资源竞争而产生的人群敌对关系中。从以上可见,在村民口述村史来源中,已淡化了征南而来的目的,单单强调自身开荒的原住民地位——朱氏族人世代代生活的土地的主人地位。在这里明初移民们自改土归流后,为隐蔽朱明移民的汉人身份,以“八大姓落籍此地”的口述族源史来为自己重新确立了一个合法化的来历,重新建构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建构可能与鄂西南民间流传的关于“土著八大姓^①”的说法有关。朱砂屯村村史是随着军屯移民由客居而土著化为历史背景逐渐延展的,他们通过族源传说把自己的“客人”身份策略地自我淡化为准当地人——“主人”,以获得当地原住民的接纳和认可,然后再以“主人”这个身份与其他的族群相融合。朱砂屯后裔族群认同变迁,有可能是当时边缘化的原因,决定了明初移民后裔的上层精英调整本族群的边界与本质,以期在以土家族为主体民族的鄂西南地区占有较优越的地位来获取资源,并真正意义上实现“落籍生根”融入当地,得到认同。

族田——“屯田”神化 屯田是军屯移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这些移民身份的象征。随着明中叶屯政废弛,卫所官吏侵吞屯田,加上清初撤卫,曾经代表朝廷的“军户”已成为编民的“民户”。对于绝大多数类似于此的“编民”军户来说,“屯田”只能成为他们这群人对自己历史追溯的一种表述。在田野调查中,朱氏族人认为屯田就是他们曾经的族田。当地人都说,屯田种稻不用施肥,产出的米,米质好,好吃;不用籬米汤。同样屯田也是他们的庇护神,在他们眼里神圣不可侵犯。村民朱云贵(59岁,土家族)讲了一则关于屯田的传说,“有一年,一

① 清光绪《利川县志》卷十四记载:利川著姓八,曰牟氏、冉氏、张氏、谭氏、朱氏、王氏、郇氏、蒋氏,皆土著也。

伙盗匪正向朱砂屯(方向)抢杀过来,村民都准备逃,突然田里的秧苗都变成了一个个士兵,一大片,把那些盗匪吓跑了。那是屯隍老爷显圣哒。”正因为有了屯田的保佑,朱砂屯移民后裔的子子孙孙才在此安居乐业。在这里他们把屯田神化。

学界认为,历史记录、传说、故事、象征、仪式等成为人们传递“异己”感觉的重要文本^[8]。传说也是一个族群(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对相似性认同的一种主观的信念,一种在特定聚落范围内的共同记忆^[9]。朱砂屯村人关于屯田的传说多注有自豪之情。屯田——神化了的事象,在朱砂屯村人建构自己共同的文化心态中扮演了双层身份:一是村民的历史记忆——先祖曾经的辉煌;二是村民自我认同的重要文化因素。同时表明,这是“我”的,“我”这个族群的,你可以用,或继续用。通过寻找或者创造某种内部的一致性来建构一个“自我”群体,通过改造或移植而形成的一致性的历史记忆会被视为族群认同意识的核心内容。“屯田”成了他们历史与文化联系的象征性链环。

如果我们对“屯田说”和前面所述的“朱氏皇族说”所描绘的一系列过程作一番重新整理后,可以发现传说的核心是朱砂屯移民在试图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和国家政权的正统性连接在一起,寻求国家政权和本族之间的媒介。通过田野调查,笔者感受到,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尽管国家的承认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是朱氏族人来历正统性的唯一来源。同时,在“屯田说”中,屯田可以看作是朱砂屯村人对于本群体出自共同血统的这样一种观念的表达,也可以是汉族移民以“国家认同”观念来强化自己的族群性,为形成新的族群认同作铺垫。

(二)屯隍庙会——祭祖仪式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屯隍庙会是朱砂屯村村民敬神娱神的狂欢节。据说,每年5月28日是屯隍老爷显圣的日子,这一天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到村中心的屯隍庙拜祖先。村里要组织唱戏等活动,一连三天。这一活动在解放前很盛行,现在作为屯隍庙会载体的屯隍庙已不存在,庙会自然只能成为一种记忆,而这种记忆随着村民们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已淡忘,直至失忆。在田野调查中,据朱云杰老人(68岁,土家族)说,(我们村)叫土地庙的那里原来有一座屯隍庙,是最早来(此地)的八大姓修的,说是有一年(此地)秧苗遭了虫灾,县官下来捉虫,被虫咬了,中毒死哒,为了纪念县官修的。

从功能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发现“屯隍庙会”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朱砂屯村包括朱氏族人在内的宗族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第一,强化了共同的地域意识。“屯隍庙会”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到屯隍庙祭拜,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屯隍庙自开村后就有,屯隍老爷是以主神的身份成为该地域各宗族共同崇拜的对象,“屯隍老爷显圣”期间对屯隍庙的祭拜必然唤起村民共同的地域意识,建立一种扩大化的拟血缘关系。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强化各族之间的横向联系。第二,加强了不同地域之间宗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增进了族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屯隍庙会”期间家家办酒,户户待客,“老表什么的,甚至隔了好几代的都要过来。”此外,在此之间由于会亲访友、聚会娱乐活动又可以加强以姻亲为纽带的宗族成员的交流,强调了以自然村落为宗族的认同,强化了以地域为边界的整合。

三、族群认同变动的内在动力及影响因素

族群的主观认同是在族群互动中产生的,它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的一种诉求。任何族群认同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要素来表述,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共同的历史遭遇和记忆也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正如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时代可以变化,条件可以不同,一个族群的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即象征一符号丛,却可以保持稳定,可以附着、渗透在不同的原有或者外来的文化特征上。”^{[10][61]}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随着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化建设,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而深入。族群共同的语言、生态环境、文化也会随之发生极大的变迁,最能代表族群性的记忆、象征、神话传说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从口述资料看,朱砂屯后裔的历史记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记忆,还是他们处于面临具体生活境遇时的一种需求。“历史人类学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而是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11]朱砂屯村人强调“共同落籍”的族源传说,以及“王室之人”的自我意识,显示明末清初时期朱砂屯村人在族群意识上的矛盾。强调“共同落籍”的族群本质,使朱砂屯村人与鄂西南地区原住民——土家族人群成为一体,并使自己占有土地的权利合法化。强调“王室之人”认同,是维系朱砂屯后裔与中原一体的苍白表述,这也是他们或“被贬”或“被抛弃”后对国家的消极认同。在这里,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简单的解读为此消彼长,但这种消极认同的后果让朱砂屯村民产生了抵触的心态,久而久之,其原有的祖源逐渐淡忘,

新的共同族源被强调。根源性所表现出来的族群认同也就失去了意义。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族群感情的重要来源,不同的历史记忆规定了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同的自我想象,也成为群体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12]。历史记忆的意义在于证实一个族群的存在,阐释和建构一个族群认同的历史。村落是一个共同体,作为共同的记忆(shared memories)——共享的历史、文化——是朱砂屯村人共同坚信的。不定期地祭祀祖先、屯隍崇拜、屯田神化等的关系是互动的,它们互相印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为村落成员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故事和媒介物都将从选择性与偶然性中脱颖而出,进入到该族群共同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中,并得以代代传承,相沿成习。尤其是对无文字的民族和族群,故事无疑是一种经典的族群记忆形式。”^[16]一个民族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村落。就目前朱砂屯村与周边村落相比较,不论是生活习俗,还是民间信仰等方面并无区别,因此难以构成村落边界。倒是朱砂屯村村民口中的“屯田”起到了区分村落边界和文化边界的作用,成为一种村落认同标识物,也成为自我认同的边界,具有强化朱砂屯村民团结和凝聚力的功能。

四、结论

通过调查与研究,并反思族群理论,我们认为在在族群建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很重要的:

(一)历史记忆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这一根本情感的纽带。“族群成员在互相认同的基础上,可以想象、改造乃至创造族群的特征或者标记,使之适应形势需要。”^[10]“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变迁造成认同变迁,人们以集体遗忘、修正后重建历史记忆来调整社区群体的范围。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和现实性是族群成员得以认同的基本本质。”

(二)主观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承续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族群认同本身就为族群提供了特定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就是他们的历史记忆。

(三)历史记忆是一个文化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能动性和记忆受众的多样性。不同现实情景造成的环境,使朱砂屯村人不断地创造和保存、修正和遗忘着关于村落的历史记忆。不同行动主体的沟通、协商、分享建构着朱砂屯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1]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 (清·光绪)黄世崇. 利川县志: 卷九: 祭祀志[G].
- [3] 团堡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利川市团堡镇乡志·村志·朱砂村[G]. 2009.
- [4] (明)李东阳,等. 撰, (明)申时行,等. 重修. 大明会典·卷十二[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7
- [5] (清·道光)利川县志: 卷之七: 选举志[G].
- [6] 王明珂. 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 当代, 1993, 9: 7-15.
- [7] 彭兆荣. 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 [8] 杜磊. 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M]. 马海云, 周传斌, 译, 王建民, 校.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1999.
- [9] 华智亚. 族谱、民俗生活与村民的记忆——对安徽T村的考察[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6(3).
- [10] 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蓝达居. 历史人类学简论[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1(1).
- [12] 鄂崇荣. 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2).
- [13] 唐启翠. 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4).

责任编辑: 谢亚平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LI Bin- Li TAN Zhi-man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44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 ethnic group of a small village in sou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legend of family migration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th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ethnic symbols can sustain and agglomerate the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migrant villages, historical memory, ethnic identity